



彭真传

第三卷

彭真传

第三卷

(1957—1978)

《彭真传》编写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卷目录

三十二、从党的八大到整风反右	(919)
三十三、在“大跃进”浪潮中	(955)
三十四、三年困难岁月	(991)
三十五、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抗争	(1034)
三十六、七千人大会和会后的调整	(1058)
三十七、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088)
三十八、北大社教运动试点事件	(1132)
三十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中	(1156)
四十、 从抵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到主持起草“二月提纲”	(1182)
四十一、“文革”暴风雨来临之际	(1209)
四十二、“文革”岁月（上）	(1233)
四十三、“文革”岁月（下）	(1257)

三十二、从党的八大到整风反右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①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八大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做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从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宣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大起，八大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彭真虽然不是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两个重要文件的讨论，并参与了其他有关事项的准备工作。据中共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研究八大事宜的各种会议、约谈、会见等一百三十余次，^② 彭真参加了其中多次会议和约谈。一九五六年七月，彭真几乎每晚都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有关八大准备工作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522页。

^② 《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19页。

的会议。七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陈云为第一召集人、邓小平为第二召集人、由二十人组成的八大选举工作委员会，彭真为成员。经过八月份的紧张工作，到九月初，人事选举方面的工作大致就绪，政治报告的起草也到了最后修改和定稿阶段。九月十日五时，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①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②这天，彭真下午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晚上参加毛泽东就政治报告的修改与几位同志的谈话。^③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下午二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万党员。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在二十七日下午的闭幕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

八大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与据此确定的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的状况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决议确定：“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

① 即董必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55页。

③ 中央工作大事记，1964年。



1956年9月，彭真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左起：董必武、彭真、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

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八大还安排了大会发言。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发言，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彭真也准备了发言稿。本来，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主抓政法工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的实践，彭真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是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思考和见解的。根据中央的安排，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专题发言由董必武来做。彭真经过认真考虑，将自己发言稿的题目定为《关于革命胜利后的群众路线问题》。

选择这个问题，他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经对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临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进行思考，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层次的理解。正如他在发言稿中所写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已经了解的东西，对于还没有了解的部分来说，不但少得微不足道，而且有些已经在实践中实现了，有些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最重要的却是现在和将来，即继续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社会发展规律和改造自然的规律如何？即我们领导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根据和条件究竟怎样？其中有很多问题，对于我们并不是都已经了如指掌的，而是新的课题，不甚了解或者不很确切了解的问题。”

彭真的发言稿通篇围绕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展开。发言稿前半部分针对在执政条件下党的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强调执政党要高度重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提出了全党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指出：

“从总的方面来说，党的作风是实事求是的，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并且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但是，在具体工作中，在部分干部的思想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毛病，还是不少的，还是相当严重的。”

“在这些同志看来，党的主张既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群众又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对党有很高的信仰，好似无须乎再在群众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也无须乎对群众觉悟有所等待，只要党作出决定，发出号召就行了。如果还需要到群众中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的话，好似只剩下‘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填鸭式的灌输过程了。因而他们就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发生了忽视群众路线和严重地违反群众路线的倾向，发生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倾向，甚至滥用党的威信的现象。这些问题，迫切地需要党给予充分的注意，并且认真地加以解决。”

与群众路线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革命领袖的作用问题。发言稿的后半部分，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晚年的错误，阐述了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指出：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个人崇拜，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启发了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以后，伴随着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群众思想的更加活跃，在我们这里也出现过这样的人，他们把党和党的领导者的作用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对立起来的糊涂思想，甚至把完全符合实际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者的正确的信仰和态度也怀疑起来。”

“这些人不了解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同志所作的批

评，是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批评把他的功绩和正确方面夸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并不是把他的功绩和正确方面也加以否定，反对个人崇拜并不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真正起过的作用和今后还会发生的作用。”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应该完全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应该完全以实际为标准。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也不要抹煞、降低个人在实际上起过的作用，或者低估个人可能起的作用。对于一个领导者，也同对其他一切同志一样，应该有多少成绩、缺点，就承认多少成绩、缺点；有多么正确就承认多么正确；有什么错误就承认什么错误；有多大的作用，就承认多大的作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的党性。这同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完全辩证的统一的。”

彭真的发言稿，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至于发言稿后半部分所写的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此前曾经在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过，并已体现在经毛泽东修改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这个问题上，发言稿的基调与这两个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彭真不过是把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讲得更直白、更展开一些。

九月七日，彭真将发言稿送大会秘书长邓小平，并附言：

“小平同志：发言稿赶出了，请阅退。如你觉得大体可用，好送书记处同志审阅。彭真九月七日”。

邓小平仔细阅读了彭真的发言稿，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于九月十七日将阅改后的发言稿退彭真，并写道：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发言，但是这篇东西，特别是后面一部分，有的人听了如何，分寸是否恰当，就要多找几个（人）斟酌才行。”

邓小平建议彭真先请陈伯达看，后送刘少奇审定，“可能的话，请主席看看”，并提出后半部分“过于突出，可以概括一点说，文字上也可得到缩短”。

八大开幕以后，彭真作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在十八日和十九日挤出时间修改发言稿，并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将修改后的发言稿送刘少奇和陈伯达征求意见。二十日下午，彭真收到陈伯达和邓力群的修正稿。这个修正稿删去了后半部分关于正确对待革命领袖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并注：“我们已另抄一份送乔木同志，请他再作一次修改”。彭真看到修正稿后，显然不愿接受这种删改，于是又将自己已送的原修改稿再送刘少奇，并附信：

“少奇同志，我有兴趣讲的是后半部分，但又恐有碍团结，如怕刺激，把比较透彻的话勾掉（如修正稿），我即不想讲了。”^①

这样，彭真既未在大会上发言，也没有将发言稿作为书面发言提交大会。

八大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九月二十八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彭真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大根据毛泽东提议，对中央的组织和领导体制作了调整，“把过去的书记处变为常委”，“多了一个总书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推荐，选举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新的中央书记处成为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毛泽东说：“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

① 彭真拟在八大上发言的底稿。

理，在那里提出议案”。^① 后来又说：“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八大选举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除邓小平、彭真外，还有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十月九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一、第二次会议，确定了书记处的工作范围和分工，明确彭真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并负责联系统战、政法和港澳部门的工作。邓小平在会上说：“以后准备彭真不当北京市市长了，市委书记肯定不当了”^②，以便集中精力搞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但他的这个意见后来没有被中央采纳，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彭真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但从八大开始，彭真的大部分精力就放在了中央工作上。邓小平曾在一次会上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书记，书记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③

八大路线的确立，标志着党和国家“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八大上，毛泽东、党中央就开始酝酿党的整风问题。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

①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第 522 页。

② 中央书记处第 1 次会议记录摘抄，1956 年 10 月 9 日。

③ 山西省史志研究所：《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见《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第 530 页。

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①

在毛泽东、党中央酝酿全党整风的时候，面对的国际、国内情况都是毛泽东所说的“多事之秋”。

国际上，突出的是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发生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最引人关注的是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他“全盘否定”是“捅了娄子”；同时认为“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大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毛泽东一再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波兰事件的成因，正如当年七月十八日波兰党七中全会指出的，“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波兹南事件“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中国党赞赏这种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情况虽与波兰事件有所不同，主要原因也是由匈牙利党的错误引发的。毛泽东在评论匈牙利党的错误时，首先指出的就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②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而执政党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201、203、204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04、406页。

在国内，形势也不平静。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三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一千一百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① 这些现象表明，随着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敌我矛盾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出来。对于当时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等事件，很多党员、干部感到困惑。这类事件怎样处理为好，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缺乏实践经验。彭真批评某些干部的思想状态是：“哪个地方一罢工、一罢课，就说：‘这地方一定有反革命吧？’”^② 也有些干部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就采取敷衍、迁就的态度。党内一些同志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有抵触情绪。彭真签发的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情况：“自从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一直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报告以前，我们对这一问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国内各种新的矛盾亟待解决的背景下开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00、401页。

② 彭真：《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81页。

③ 《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46页。

始酝酿的。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花费极大精力，集中地研究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课题，思想逐步系统、深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整风运动是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或者群众运动一轰。”就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宣布明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刘少奇在会上着重讲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广大干部不要脱离群众的问题，防止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接过话题说：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①会上，毛泽东还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被打倒。接着，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下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了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二月二十六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会议三十七人的范围又讲了一次。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有一千八百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正式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后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定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讲话，彭真都在场聆听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讲即将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26页。

开展整风，却为这次整风提出了根本指导思想，就是要求全党在新的形势下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此，周恩来讲得很透彻，他说：“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首先要把共产党搞通。”“为着要把共产党首先搞通，所以我们主张在现在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风。”^①

此前，彭真有一次重要的出访活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彭真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几国，并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直到一九五七年二月一日下午，彭真一行才从莫斯科返回北京。

从国外归来后，彭真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参与处理国内问题。查阅彭真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日程，包括：参加二月五日中央书记处第十八次会议、二月十二日第十九次会议，都是讨论罢工、请愿和少数地方的闹事等问题；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应毛泽东之约商讨问题；参加二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少数工人请愿罢工，要承认是合法行为，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法。此起彼伏地解决，可以避免大规模地爆发。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应该采取这种方法。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反对官僚主义。二月二十八日，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请愿问题的指示（初稿）。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下发的这个指示再次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27页。

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①

三月六日至十三日，彭真出席中央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会议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教育、文艺、新闻、大学和科学等五个座谈会，彭真出席了其中的四个座谈会，还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各小组汇报情况的会议和小范围谈话。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发表讲话，从思想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主题。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沿途又作了四次讲话，这些讲话既是唤起全党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党内整风的动员。

毛泽东南下返京后，于四月十九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内容十分具体的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②

彭真和北京市委对传达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十分重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北京市委“即迅速地大规模地组织了传达，到三月底为止，先后听了传达的有党内外干部、教职员、大学生、工人党员、民主人士、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等，共约

①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38、139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3页。

三十五万人。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三日，市委召开了有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千四百人参加的宣传会议”，“因为有中央宣传会议的示范，会议采取了放的方针，开得比较生动活泼”。会议期间，“市委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等学校校长、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师，文艺界、医务界和体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五次，共八十人）”。^①

统一战线工作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月一日，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统战工作。当讨论到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彭真与时任中央统战部的李维汉有这样一段交谈：

李维汉：民主党派问题，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外，还有尊重他们平等、独立、自由的问题。小平同志还提出“在宪法范围内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很多人怕在这个方针上出乱子。我们谈，方针应不含糊，但没有经验。过去民主党派是由统战部管着的。现在放，先由统战部放，但出乱子怎么办？我看准备出乱子，出了乱子再说。

彭真：他们不否定党的领导，问题是如何领导。

李维汉：过去统战部也有说法，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是领导被领导关系，而领导是统战部。我看，决定一条，今后统战部根本不要管他们的事。选谁就是谁。错了由社会舆论来批评。

（与会同志同意这个态度。）

彭真说：关于民主党派，组织上、行动上就是允许他们独立自由，但政治上总是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条没有改变。组织上行动上他们有独立自由，不干涉，但不干涉并不包括批评的武器，

^①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传达和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见《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45、246页。